

Chapter 1

第一章

理论思维的价值

理论思维是科学研究者以抽象化、逻辑自洽的方式将现实中发生的事件、现象和行为组织起来，从中发现有规律的模式并寻求科学解释的探索活动。作为研究生阶段学术训练需要掌握的一项核心能力，理论思维提供了观察问题的视角、甄别事实的工具、组织证据的框架以及进行论证的逻辑链条。本书旨在帮助读者将社会科学理论中的基本概念与思维方式有机地融入自身的研究设计之中，在自己的学位论文或研究项目中搭建清晰而严谨的理论框架。



一、以理论思维引领研究创新

理论框架是社会科学研究论文框架搭建的“骨架”，更是灵魂。如果缺乏理论思维，研究往往会沦为事实的堆砌，缺乏深度和说服力。相反，理论观点明确而清晰的研究能够呈现出高度的内在一致性和逻辑的层层递进。

根据研究生学位论文的一般要求，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在获得学位之前，需要掌握本学科或本专业的基础理论和知识，并具备开展学术研究的能力。当然，对于不同层次的研究者而言，如何体现他们对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存在着要求上的差异。硕士生一般需要能够借助既有理论来分析现实问题，博士生则要在学术研究领域作出创新性成果。所谓创新，并不是完全脱离前人，而是在既有理论的基础上作出新的解释、拓展或修正。这意味着，博士生不仅要能够理解和运用既有理论，还必须展现出原创性的思考，建构出自己的理论框架。

然而，根据我多年从事社会科学教学研究的经历，特别是讲授理论与研究方法课程的经验，以及指导硕士、博士论文并参与多所高校学位论文评审的实践，我深知对大多数研究生而言，真正开展创造性的理论工作并非易事。理论创新不仅需要坚实的学术积累、敏锐的思维能力，还需要有充足的学术资源与支持。许多研究生在面对“创新”的要求时常常感到困惑，甚至不知如何迈出第一步。

在这里，我们也需要澄清一个常见的误区：创新并不是“为

赋新词强说愁”。翻阅中外学术文献，我们会发现不少学者尝试提出新的概念或“主义”，但未能产生持久影响。这是因为知识的创新并不等同于创造新词汇，而是要通过新的概念化与理论化方式回应现实的困惑。如果一个新概念既没有与现有理论传统建立必要联系，也没有揭示新的事实或生成新的知识，它就难以获得学界的广泛认同。由此可见，并不是每项研究都必须提出全新的理论、方法或框架来彰显其独特性。

近年来，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尝试从不同角度开展理论创新，但也都强调与已有知识体系的对话，由此产生的成果获得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讨论。比如，秦亚青从中国文化思维中的“关系”概念出发，在融合“建构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关系主义”理论。^① 阎学通借鉴中国先秦思想中关于“王道”和“霸道”的区分，同时结合现实主义理论，构建了“道义现实主义”理论，用来解释国际领导权竞争问题。^② 唐世平提出的国际政治社会演化理论是对社会演化理论在国际政治领域的拓展，但又通过理论整合将进攻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和制度主义纳入一个解释框架之中。^③ 从这些已经被认可的案例看，理论创新并不一定是，也不可能总是颠覆性创新，更有可能是通过创造性地借鉴和利用现有知识资源，进行新的理论整合，对经验现象提出更优化

① 秦亚青. 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Yaqing Qin, *A Relational Theory of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② 阎学通. 世界权力的转移：政治领导与战略竞争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Yan Xuetong, *Leadership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9.

③ Tang Shiping, *The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唐世平. 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 8000 年到未来 [M]. 董杰旻，朱鸣，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

的理解。

理论思维应该是一种贯穿研究全过程的思维活动，如图 1-1 所示。理论可以帮助研究者识别哪些问题具有学术价值，哪些问题仅仅是事实陈述。一个好的研究问题往往是从理论争论或理论与现实的张力中产生的。研究者需要理解既有理论的核心观点、适用范围、局限性以及彼此的争议。最终，要将自己的研究定位到理论谱系中的一个特定空隙或争议点，以此论证自己研究的必要性和理论贡献的潜力。理论为研究提供了概念体系和逻辑链条，它指导研究者选择核心变量、定义它们之间的关系，并提出可检验的研究假设。理论还可以指导研究者对可以获得的数据进行解读，发现结果背后的因果机制，并且将研究发现嵌入更广泛的学术脉络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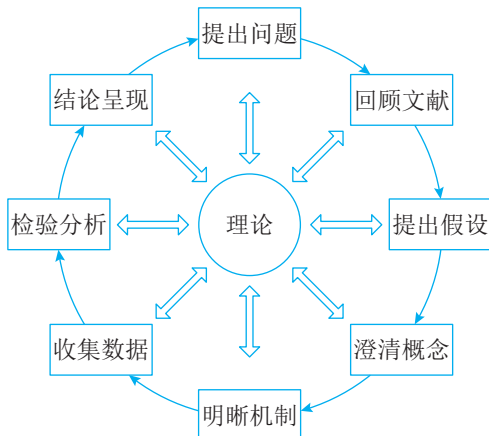


图 1-1 理论贯穿研究全过程

因此，从研究的初始阶段起，研究者就需要考虑如何从理论视角构思整个研究项目。从文献检索到研究问题的提出，从核心概念的界定到分析框架的搭建，再到实证分析的展开，每一步都

需要带着明确而自觉的理论意识。这种意识要求研究者不仅要与具体的研究问题对话，更要与文献对话、与理论对话、与学术大师和学术传统对话。只有这样，研究者才能从研究问题本身出发，恰如其分地选择或者开发最为有效的理论工具，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答疑解惑”。

二、用理论思维认识复杂现实

理论归根结底是一种关于现实世界的逻辑叙事。它通过抽象、简化与重构，将纷繁复杂、难以把握的经验现象转化为可以被观察和认知的框架。好的理论能够抓住现实中最根本、最重要的要素，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和解释力，因此得以成为学界普遍依赖的分析工具。

理论思维的核心要素

- 从复杂现象中抽象提炼，识别有趣的现象；
- 合乎逻辑地思考问题，保持严谨和一致；
- 运用系统的经验事实，批驳、验证和支撑论断；
- 保持开放心态，面对现实变化不断调整和修正自己的认知。

我们生活在一个由主权国家组成的世界之中。无论每个人是否觉察，自己的成长、教育、职业、生活以及福利等方方面面，都与本国政府和社会的运作方式息息相关。那么，为什么国家会成为人类社会一种占据主导的政治组织方式？为什么各国的规模和治理能力存在显著差异？为什么有的国家贫穷而有的国家富裕？为什么一些国家能保持政治稳定，另一些国家则陷入动荡？

为什么经济发展状况相似的国家，有些社会福利水平高，有些社会福利水平低？这些问题的解答，离不开深入的理论思考。

理论思维正是区分社会科学学者与一般兴趣爱好者的主要标准。社会科学的理论化方式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当代世界的各种现象。在社会现象背后，我们关心的问题往往包括：国家、组织和人的行为选择有规律吗？推动国家兴衰的核心因素是什么？为什么国家之间会走向合作或竞争？这些问题若仅凭直觉或价值判断，难免流于主观，而理论思维却能为我们提供清晰的解释。在社会科学中，理论与经验在研究中的联系主要通过三条逻辑路径展开：其一是演绎模式，从逻辑推导出发构思命题，然后用经验材料加以检验；其二是归纳模式，在分析经验材料的过程中生成理论；其三是溯因模式，从所观察的现象反向推导最合理的假设。^① 理论的根本任务，就是帮助我们识别社会现象背后的动力机制，揭示其深层逻辑。

在回答国家经济增长的动力这一问题时，不同的研究者可能从各自的理论立场切入：有的强调政治体制的作用，有的聚焦于产权制度的影响，也有学者会关注执政者的偏好和需求。面对当前中国和美国之间激烈的战略博弈，存在经济利益之争、国际主导权的博弈、社会制度的对立、生活方式的差异，甚至文明冲突的叙事，都可能构成对这一现象的解释。面对这些差异性答案，严肃的学术研究不应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态度予以调和或回避，而是应该利用科学方法对不同的理论命题进行仔细的比较和严格的检验，评估它们在解释力上的相对强弱。理解这些重

^① 艾尔·巴比. 社会研究方法 [M]. 邱泽奇,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5: 55. 阿托卡·阿丽色达. 溯因推理: 从逻辑探究发现与解释 [M]. 魏屹东, 宋禄华, 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24.

大问题的关键在于，不应停留于情绪或价值立场，而要深入探究现象背后的因果机制，找到具有说服力的答案。

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家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Neal Waltz）将理论比作一幅高度简化的图画，其中呈现出世界运行的主要因素和动力。^①换言之，理论是理解世界运作的钥匙。它的目的正在于揭示驱动世界运作的关键因素，以及这些因素的组织方式与相互作用。通过理论，我们不仅能够识别因果关系，还能将零散的要素整合成系统性的结构，以解释复杂的现实。

什么是理论

理论所做的，就是在我们的脑海中呈现出世界某一部分的图画，在这幅图中明确了发挥作用的主要原因……然后，你可以将那幅图画和假设的因果力量与现实世界进行比较……理论所做的就是忽略大部分内容。你在进行简化，寻找那些突出的因素。

——肯尼思·沃尔兹

理论还可以帮助我们在不确定性中识别出确定性。许多人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不确定的时代，变化往往超乎想象。但事实上，现实世界仍然遵循某种相对确定的逻辑。就像走出一栋建筑时，出口的数量与位置由建筑结构所决定，选择虽存在，但并不是无限的，也不是毫无依据可循。每个国家的政策选择也是如此，选择的范围虽然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干扰，却并不是毫无规律。

^① Kenneth Waltz: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onversations with History*, 2003-2-9, <https://iis.berkeley.edu/publications/kenneth-waltz-theory-and-international-politics>.

人们有时会夸大各种因素组合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但在实践中，决策者的许多选择受制于固有的结构性约束。任何国家的领导人都必须考虑邻近国家的潜在军事威胁，并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看似突发性的军事入侵，其背后更有可能是因为防御方准备不足，或情报部门未作出正确评估所致，因此被归因为决策体系的失败。理性的国家政策，应当在不同可能性之间进行权衡，而不能仅仅寄望于理想化的和平局面。

人们如果不依赖某种理论，就无法理解复杂世界，因为现实过于繁杂，必须用某种方式来对事件进行排序。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就指出，即使自认为不是理论家，人们也在依赖隐性的理论思维理解世界——可能是粗略的权力政治逻辑，也可能是某种道德主义框架。学者的职责，就是将这些隐性的理论显性化，使其逻辑更加一致和严谨，让学术共同体来加以讨论与批评，从而对这些理论的合理性作出评判。^①

敏锐的研究者应当特别关注理论与现实之间的落差。当某些现象偏离理论预期时，研究者需要追问背后的原因，思考为何现有框架无法解释这些事件，并对理论进行修正或扩展。理论与现实的张力，往往为新视角和更具解释力的理论模型提供研究契机。从某种意义上说，选择研究课题的关键，正是在于发现理论与现实之间的不一致。

每一种理论都有其适用的范围与限度，也都有其最能够发挥解释力的问题领域。甚至在某些具体的研究问题上，往往只有某

① Robert O. Keohane: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Conversations with History, 2004-3-8, <https://iis.berkeley.edu/publications/robert-o-keohane-theory-and-international-institutions>.

一种理论能够提供最为恰当、最具解释力的答案。这种看法可能会被批评为带有某种“知识独断论”的色彩，似乎缺乏对多元视角的尊重与包容。然而，这里所强调的并不是否定其他理论在解释同一问题时可能具有的某种合理性，而是主张在面对具体研究问题时，研究者应当尽力寻找一套更优化的解题方式，以便推动认识的不断深化，并在此过程中不断拓展知识的边界。

事实上，许多理论本身就带有明确甚至苛刻的适用条件。正如物理学家在进行物体运动轨迹计算时，往往以“真空条件”为理想化前提，社会科学中的诸多理论同样如此。以价格机制理论为例，它揭示了市场价格如何通过供求关系实现资源配置的自我调节，但这一理论需要以充分的市场竞争作为假定前提。当市场缺乏充分竞争或者存在着较强的国家干预时，这一理论的适用性就会显著下降，原本的解释力也会受到削弱。

理论的根本功能在于帮助我们识别现象背后的规律与驱动因素。它使我们能够理解不同的力量如何在特定条件下组合并生成特定的结果，并在充满不确定性与复杂性的世界中，提供一种结构化的思维方式。借助理论，我们不仅能够更清晰地把握现实运行的逻辑，还能够在有限的知识框架内预见其潜在的演变方向。

三、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

面对充满不确定性和变革的世界，加上技术的不断迭代与发展，有人认为理论研究的价值大大下降，社会科学研究应该更多地关注实际问题的应对和解决，而非纠结于对理论的探讨。在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知识生产似乎必须具有明确的实用目的，能够解决现实问题，服务于特定的群体和目标。

然而，这种观点往往忽视了一个关键问题：如果不理解某个现象发生的根本原因，我们又怎么能设计出有效的解决方案？著名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D. Sachs）提出：面对当今世界愈演愈烈的冲突，学者们不应仅仅停留在追寻战争原因的层面，而应该更多地关注如何结束战争、如何解决冲突。他举例说，公共卫生学院培养的人才应该专注于如何防控疫情的实际工作，而不是探讨疾病的根源。但是，如果没有医学家对病毒传播机制的深入研究，公共卫生学院的学者和学生们又怎么能有用武之地呢？

实际上，理论思维的核心——科学地揭示因果关系，恰恰是设计出有效政策和解决方案的前提。因果推理不仅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工具，也是理论构建的基石。在面对复杂的社会问题时，简单的相关性分析往往无法提供足够的洞察力。而通过因果推理，研究者能够从已知的事实和现象中推导出社会问题产生的潜在原因，并通过进一步验证，不断完善和修正理论框架。因果推理的最大意义在于，它能够让我们超越单纯的现象描述，进而对深层次的机制和内在规律形成理解。

在学术论文中，研究者通常需要从学理价值与现实启示两个角度来阐述一项研究的意义。一项研究如果既能贡献新的学术成果，又能对现实问题的解决有所推动，自然是最理想的状态。然而，在实践中，二者往往难以完全兼顾，学者需要在先后轻重之间作出权衡。毕竟，理论研究与政策研究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研究方向。

理论首先不是为实际问题提供直接的解决方案，而是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社会现象，提升我们分析问题的能力，然后才能谈得上解决问题。理论不一定能够立即为某个问题提供具体的解决路径，但它提供的认知框架、思考方式和价值观，却能深刻影

响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需要认识到，从认识世界到改造世界之间有一定的距离，需要应用性学科将二者更好地链接在一起。解决实际问题需要理论支撑，无论是对因果关系的推理，还是对社会现象的深刻剖析，都有助于我们在复杂和多变的现实中作出更加理性、科学且有效的决策。没有理论的指导，实践就难以应对复杂的社会问题，最终可能陷入盲目。

近年来，社会科学界普遍意识到学术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存在鸿沟。一派学者主张，科学研究的目标在于发展和积累知识，而非直接提供政策处方；另一派则强调，知识应当服务于现实世界问题的解决。在美国学界，这种分歧尤为明显：大学里的学术研究者与智库中的政策分析者分属不同阵营，两者之间的对立常被形容为“理论与实践的鸿沟”。^①然而，这道鸿沟究竟是出于学术分工的自然结果，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还是存在互补的可能？对从事研究的学者而言，又该如何在二者之间寻找平衡？

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是从事研究的学者面临的两种基本取向，两者的区别见表 1-1。尽管两者在研究对象和工作方式上有所不同，但并不存在高下之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融入全球经济、参与国际事务过程中面临的困惑与政策需求，为从事国际经济、政治研究的学者提供了丰富素材与现实动力，但也让部分决策者、公众乃至学者过分期待理论能够直接回应现实问题，因而模糊了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的界限。^②

① 约瑟夫·奈. 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相关性[J]. 国际政治研究, 2009(3): 105-116.

② 王辑思. 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相脱节的症结与出路[J]. 国际政治研究, 2009(3):1-11.

表 1-1 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

	理论研究	应用研究
研究目标	追求知识积累，解释世界运行的因果关系，强调抽象与普适性	解决现实问题，为决策者提供可操作的政策建议，强调实用性与针对性
时间尺度	长期导向，关注普遍性、结构性问题，不急于即时见效	短期导向，回应紧迫现实需求
价值立场	追求客观性，避免被特定利益和情感左右	明确服务于特定国家、群体的需要，价值导向鲜明
评判标准	是否具有解释力，是否增进对某个问题的理解，作出学术贡献	是否能够有效解决现实问题，是否被政策制定者采纳，是否能带来可观察的社会效益

理论与应用研究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研究目标、时间尺度、价值关怀和评判标准等方面。从研究目标来看，理论是知识导向的，旨在通过抽象与框架化解释复杂世界；应用研究则是行动导向的，意在为决策者应对紧迫问题提供可行指南。从时间尺度来看，理论研究关注长期的、具有普遍性的现象，而应用研究多着眼于短期的应急事务。从价值关怀来看，理论研究强调保持客观和价值中立，以揭示社会现象的本质机制；而应用研究则必须根据具体的国家利益与现实目标，因地制宜地提供政策建议。从评判标准来看，优秀的理论研究能够用最简约的要素解释最广泛的重要事实，并吸引学者在其框架下持续展开研究，从而形成系统的研究纲领；而优秀的应用研究，则要看其是否能够解决现实的燃眉之急，帮助决策者实现既定目标。

好的应用性研究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不过如果仅仅以实用性和政策相关性来评判知识的价值，忽略理论在学术上的支撑性作用，就会导致学术研究的功利性，这样显然无益于学科的良好

发展。^①对于仍处在学术训练阶段的硕士与博士研究生而言，追求研究的政策影响力既不现实，也非当务之急。学生既缺乏提供咨询服务的渠道，也没有从事此类工作的必要性。更为可取的途径，是通过扎实的学理训练提升写作与思维能力，产出高水平学术成果，在未来进入大学或研究机构后，再逐步推动知识的社会转化。处在学术成长期的年轻研究者需要增强学理功底的积累，而不是追求即时的政策功效。

四、人工智能时代的理论研究

在当今世界，政治格局错综复杂，国际冲突频繁升级，经济体系呈现出分化与失衡的趋势，科技发展更是以加速度推动社会的深刻变革。这些变化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塑造着我们的生活，也无疑会影响社会科学的发展。社会科学因为现实世界的巨大变化获得了大量丰富和新鲜的研究素材，与此同时，理论研究的价值也遭遇了质疑。特别是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关于理论研究是否仍然具有必要性与不可替代性的讨论，也成为关乎学术发展方向的热点问题。

（一）大数据的价值与限度

一种观点认为，大数据所提供的相关性信息已经足以满足社会科学的核心目标。通过描绘事实与行为之间的关联模式，大数据不仅能够呈现现象的表面规律，还可以为事态的走向和未来的选择提供精确的预测。在这种视角下，传统理论所强调的因果关

^① 秦亚青.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进步与问题[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8(11):22.

系探究似乎显得多余。支持者强调，在掌握海量数据的情况下，模式识别与相关性挖掘即可为社会治理与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直接依据，从而使深层次因果研究的必要性大幅下降。

在大数据广泛应用的今天，相关性也无法取代因果性。如果仅凭表面相关性进行推导与决策，而忽视了真实的因果机制，就可能导致严重的认知偏差与决策失误。大数据确实能够揭示现象之间的统计性联系，但它并不能回答这些联系究竟是偶然巧合、虚假相关，还是基于真实因果机制的体现。我们当然不能否认，在一些场景中，仅凭相关性已经足以支撑实践操作。例如，如图 1-2 所示，商家通过分析大量消费数据，可以精准地投放广告，进行商品推荐，在此过程中并不必深入探究消费行为背后的心理或社会机制，就能实现节约成本和提升效益的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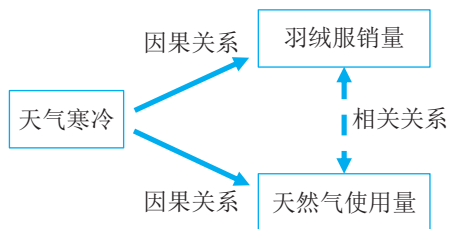


图 1-2 相关不等于因果

与此同时，在关乎社会重大利益的许多问题上，仅仅依赖相关性往往会带来巨大的风险与代价。在医学研究和公共卫生领域，病毒传播规律的分析、药物的研发与应用仍然需要依托严格的因果推断。如果仅凭表面相关性来指导实践，极有可能导致方向性偏差，甚至引发灾难性的后果。因此，因果分析不仅不可或缺，而且是保障社会科学研究科学性与有效性的根本条件。

实际上，现实世界中的许多研究对象并不存在完整而系统的

“大数据”。即便是政府机构或大型企业能够收集到庞大的数据资源，在社会管理和商业决策上也有实用价值，但这些数据所覆盖的议题范围是非常有限的。许多核心的社会科学议题，例如社会权威、合法性、规范等整体层次概念以及情绪、信念等个体层次概念，虽然也可以进行概念操作化和数据收集，但远远达不到，也很难达到“大数据”的规模。对于研究者而言，能够通过网络抓取或其他途径获得的大数据所能解决的研究问题也存在范围上的局限。对于大量只存在有限数据的研究对象和问题，研究者仍然需要运用严谨的因果推理发现其中的模式，揭示其背后的逻辑和机制。

（二）用人工智能辅助因果推断

对于人工智能应用于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因果推断的前景，以及由此带来的冲击，仍然处在发生和发展过程中。

人工智能无疑能够帮助社会科学研究者进行理论构思和因果推理。首先，核心算法往往基于因果思维而构建，通过复杂的建模与计算，可以在高维度、非结构化的数据中识别模式、提取规律，甚至通过因果推断方法发现关键变量及潜在机制。基于因果推断框架的“因果人工智能”（Causal AI），正致力于开发能够从观测数据中自动学习和发现复杂因果结构的算法，帮助研究者识别出那些超越直觉的、潜在的因果路径和混淆因素。^①

其次，人工智能正在构建理论检验的“虚拟实验室”。传统理论检验受限于历史数据的一次性，我们无法观察反事实。以大语言模型为基础的“生成式行动者”（Generative Agents），提

^① 朱迪亚·珀尔，达纳·麦肯齐. 为什么 [M]. 江生，于华，译. 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

供了前所未有的模拟能力。^① 研究者可以通过设定不同的理论初始条件和互动规则，创造出模拟真实人类行为的“硅代理人”（homo silicus），构建一个虚拟的社会实验室。^②

最后，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帮助社会科学家更加快捷地处理原本难以驾驭的数据规模，在理论推理和检验时提高研究效率与准确性。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可以帮助研究者快速而精准地分析庞大的政策文本、新闻报道以及社交媒体内容。计算机视觉可以解析图像与视频中的社会行为，为研究者提供对群体动态和社会互动的新型观测工具。

需要注意的是，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并不意味着理论（或者因果分析）的终结，反而对研究者的理论思维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发现模式，但无法准确判断模式的社会意义；可以进行模拟，但无法自动设定模拟的前提；可以生成假设，但无法构建假设之间的逻辑。研究者在使用人工智能时，需要提出富有洞见的初始问题，为人工智能设定符合理论逻辑的边界条件，批判性地解读人工智能发现的意外模式，并最终将机器的计算能力与人类深刻的领域知识、价值关怀和想象力结合起来，形成更强有力的解释。

更进一步说，目前人工智能应用于社会科学的作用仍然是辅助性的，在行为模式识别、舆情变化监测、政策效果评估等方面有其应用价值，但并没有替代人类研究者。关键变量的选取、不同解释之间的合理性比较、研究结论与现实社会之间的契

① 庞珣. 人工智能赋能社会科学研究探析——生成式行动者、复杂因果分析与人机科研协同[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24(7): 5.

② Gati Aher, Rosa I. Arriaga, Adam Tauman Kalai, Using Large Language Models to Simulate Multiple Humans and Replicate Human Subject Studies[C]. Honolulu: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chine Learning, 2023:337-371.

合度，这些环节都离不开研究者的独立判断与批判思维，而不能完全交由算法与机器决定。对于价值观念、文化冲突、社会认同等更深层次的问题，更是需要依赖理论思维与人文关怀来进行探讨。

总之，随着数据规模的扩张与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社会科学研究的工具箱确实比以往更加丰富。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工智能可以取代理论研究，或否认理论在社会科学中的根本价值。无论技术如何进步，理论思维——那种化繁为简、直击本质、构建逻辑框架并进行批判性反思的能力——在回答人类面临的众多政治、经济和社会现象时，仍然是我们最核心、最不可或缺的知识能力。

拓展阅读

[德] 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商务印书馆 2013 年版。

这本书是社会科学方法论领域不可不读的经典。书中关于“理解”与文化意义关系的论述，阐明了社会科学为何必须依赖理论。

[德] 尤尔根·哈贝马斯：《社会科学的逻辑》，黄渡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3 年版。

本书以学术论战的方式探讨实证主义、阐释学、功能主义与认识论等关键议题。九篇论文层层递进，追问作者自身的方法论立场，引导读者思考方法论的选择及应用。

[美] 托德·多纳、[美] 肯尼斯·赫文：《社会科学研究：从思维开始（第 10 版）》，潘磊、马帅超、李涤非译，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

本书系统梳理科学研究的基本步骤，从问题提出到理论建构，帮助读者养成系统化的科学思维，理解理论在解释、预测与批判中扮演的多重角色。

[美] 理查德·保罗、[美] 琳达·埃尔德：《思辨与立场：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批判性思维工具》，李小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4 年版。

这本书是国际批判性思维权威入门书，能够帮助读者评估并改进自己的思维方式，识别偏见与立场，为复杂生活与学术问题提供理性思维工具。